

《交州藁》中的安南書寫^{**}

李 嘉 瑜^{*}

摘 要

蒙元時期幅員至廣，讓元代文學相較於漢族王朝時代，具有更多新穎且富文化意蘊的議題，異域書寫就是其中之一。安南與蒙元帝國之間，不論是戰爭或和平時期，兩國的使節始終往來不絕，這也使得元詩中的安南紀行詩數量頗為可觀。

本文將以陳孚（1259-1309）作為個案，身為南人的陳孚，至元二十九年（1292）被選任副使，隨梁曾（1242-1322）出使安南，《交州藁》收錄的即是其使交「往來道中所作」的安南紀行詩，共 108 首。

作為帝國使者，陳孚的安南之行是負有國家使命的，通過這種特定的視角所展示的異域，顯然是不同於一般的旅行者。本文將關注陳孚究竟如何描述他的安南遊歷？而安南又以什麼樣的「形式」或「形象」被主體所感知？此外，《交州藁》既以詩歌作為表達形式，那麼，這種表達形式對他的安南書寫究竟產生何種影響？這些問題的釐析，將有助於我們對《交州藁》的瞭解。

關鍵詞：元詩、安南紀行詩、異域書寫、陳孚、交州藁

2015 年 4 月 19 日收稿，2016 年 10 月 10 日修訂完成，2016 年 11 月 17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教授。

** 本文為 103 年度科技部專題計畫之相關研究成果，計畫編號：MOST103-2410-H-152-014。又本文初稿曾宣讀於第 14 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承蒙講評人崔成宗教授與《漢學研究》匿名審查委員惠賜卓見，使本文的論述能得到深化與補正的機會，謹此致謝。

一、前 言

使節的異域書寫可以追溯至唐代，¹但在被稱為歐亞大交流時代的蒙元時期，²帝國境內往來頻繁的使節團，牽動了大量使節詩文的出現，以安南（今越南北部）為例，不論是戰爭或和平時期，兩國的使節始終往來不絕。蒙元帝國向安南遣使至少 37 次，安南為 60 次。³目前可知的元使安南詩文集有八種，⁴《安南志略》的「至元以來明賢奉使安南詩」，則收使節詩 21 首；⁵這些環繞著安南的異地經驗所展開的書寫，是元代文學極具特色的部分，⁶它們不但再現（representation）了書寫者所感知的異域，而負有國家使命的使

- 1 唐初的王玄策曾四次出使天竺，典籍多有記載，如唐·釋道世，《法苑珠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卷 4，頁 296，「唐顯慶二年，敕使王玄策等往西國，送佛袈裟」，王玄策將異域經驗寫成《中天竺國行記》，此書雖已佚失，但目前俄藏敦煌寫本有殘卷，參見鄭炳林、魏迎春，〈俄藏敦煌寫本王玄策《中天竺國行記》殘卷考釋〉，《敦煌學輯刊》2005.2: 3-11。
- 2 (日)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顛覆世界史的蒙古》（新北：八旗文化出版社，2014），頁 111，將蒙元時期稱為「歐亞大交流的時代」，其認為除了將中華地區納入蒙古世界帝國外，「十三世紀末，從東海經印度洋到中東的海上通路整體，便在和平狀態下掌握於蒙古手中。人類史上首次圍繞著歐亞陸海循環的交通網遂是形成。」（頁 115）而通過此一陸海暢通的交通網，形成了歐亞之間人與物的大量交流。
- 3 王英，「元朝與安南之關係」（廣州：暨南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02.5），頁 26-35，整理出二項統計表，表一「元朝遣往安南之使者」，表二「安南遣往元朝之使者」，據此，前者共 37 次，後者共 60 次。
- 4 劉玉琚，〈中國使節文集考述——越南篇〉，《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07.3: 30-31，考察元代使節出使安南的詩文集，可知者有八種：張立道《安南錄》、李克忠《移安南書》、徐明善《安南紀行》、陳孚《交州稿》、蕭泰登《使交錄》、文矩《安南行紀》、智熙善《越南行稿》、傅與礪《南征稿》，存者為三，分別是徐明善《安南紀行》、陳孚《交州稿》、傅與礪《南征稿》。
- 5 元·黎鋈著，武尚清點校，《安南志略》（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17，頁 391-398。
- 6 異域書寫原就是元代文學極具特色的部分，如李嘉瑜，《元代上京紀行詩的空間書寫》（臺北：里仁書局，2014），頁 2-4，就將「異域書寫」與「內部的他者書寫」、「異國人士的中國書寫」同列為元代空間書寫值得關注的面向；查洪德，《元代詩學通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 97，「元代詩人遊者眾，紀遊詩因而也發達，數量眾多，成為元詩中的重要一類，其中有特色的，是上京紀行詩與奉使詩。」

節身分，則讓這種再現必然經過加工與變調，如同廖肇亨所指出的「使節文化書寫（包括詩、遊記、奏議等）雖然亦不無抒情言志的部分，但更重要的卻是：必須充分傳達背後政權的姿勢與聲調」，⁷也就是說，使節的異域書寫不僅是一種「眼見為憑」的旅人凝視（gaze），亦將受制於特定的政治與文化論述。

在此思考框架下，本文將聚焦於蒙元初期中國遣派安南的使節——陳孚（1259-1309），⁸以陳孚的《交州藁》作為探討文本，⁹檢視《交州藁》究竟如何觀看安南以及其書寫模式。陳孚在元初的詩壇並不活躍，他的重要性主要是經由歷史的回顧才被彰顯出來，¹⁰尤其是《交州藁》、《觀光藁》與上京紀行等紀行之作，洪武時期的皇甫暉（生卒年不詳）就認為「自其家以至於

7 廖肇亨，〈從「搜奇獵異」到「休明之化」——由朱之蕃看晚明中韓使節文化書寫的世界圖像〉，《漢學研究》29.2(2011.6): 75。

8 陳孚的生卒年，有二說。一說根據明·宋濂等著，《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190〈儒學二〉，頁4339，言其卒於大德七年（1303），「年六十四」，由此，生卒年當為1240-1303。一說據元·陳邁，〈陳孚墳志〉，《臨海墓志集錄》（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2），頁86，「公于宋開慶元年己未七月二十六日生」、「至大二年己酉六月初四日卒于官」，生卒年當為1259-1309。李修生等編，《全元文》第20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頁571-573，收錄陳孚於大德十年（1306）所寫的〈儀氏先塋記〉，可見《元史》所記有誤。又〈陳孚墳志〉為孚子陳邁所撰，於1985年6月於浙江省白水洋鎮楊畝前園出土，現藏於臨海市東湖石刻碑林，是有關陳孚生平的第一手資料。王德毅、李榮村、潘柏澄，《元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頁1271，據〈陳孚墳志〉與陳孚〈交州使還感事詩〉自注，認為《元史》有誤。故本文以〈陳孚墳志〉為據。

9 《交州藁》收錄於《陳剛中詩集》第2卷。《陳剛中詩集》共三卷，附錄一卷，傳世者以天順四年（1460）沈琮廣州刊本時代最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流傳最廣，但四庫本缺字較多，如〈羌里歌〉、〈石假山〉、〈全州〉、〈過牂牁江〉、〈過邕州崑崙關〉、〈安南即事〉等詩皆有缺字，故本文以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明天順四年沈琮廣州刊本作為討論依據。此外，楊訥主編，2014年由中華書局影印出版的《元史研究資料彙編》，第27冊的《陳剛中詩集》是據陶湘輯刻的《託跋廬叢刻》影印，內容與版式與沈琮廣州刊本完全相同，其後亦有沈琮識語，所據者應為沈琮廣州刊本。又《交州藁》的「藁」同「稿」，沈琮廣州刊本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皆作「藁」，故本文從之，相關引文如作《交州稿》，則從其出處，不另作更動。

10 楊鐮，《元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頁400，即言「儘管陳孚在當時詩壇並不活躍，但在後世的詩論家心目之中，他始終是元詩的一線詩人，在元詩總集裡，他的入選率是最高的一級。」

京，自京以至於安南道途往返紀行諸詩，山川草木蟲魚以至人物詭異之壯（案：狀），靡不具載」，¹¹ 其中《交州藁》無疑是陳孚詩作中，最受矚目者，¹² 不但獲得中越選本¹³ 與評家的肯定，¹⁴ 亦廣收於史志中。¹⁵ 目前有關陳孚及其詩的討論，亦以《交州藁》為主，研究者普遍認同《交州藁》所展示的是書寫者親身經歷的真實經驗，如王玫珍將《交州藁》中的安南紀行詩列入元代邊塞詩的新類型之一，稱「西南邊陲的傳說異俗，都在陳孚耳目所及，盡收詩作中」；¹⁶ 王皓對《交州藁》所進行的文學考察，也側重於記事性，將陳孚的安南紀行詩稱作「記實報導」、「平實記詠」。¹⁷ 我們面對的問題在於，《交州藁》中有許多奇異詭譎的異事，比如〈安南即事〉附注提及的「峒民頭有能飛者，以兩耳為翼，夜飛往海際，拾魚蝦而食，曉復歸，身完如故，但頸

11 明·皇甫暉，〈陳剛中詩集後序〉，《陳剛中詩集》，據《託跋廬叢刻》影印，《元史研究資料彙編》第 27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 684。

12 以顧嗣立《元詩選》為例，此選本中的〈陳孚傳〉，《元詩選·二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212，評述陳孚詩時，全都援用皇甫暉〈陳剛中詩集後序〉之說，卻只述及安南之作，「其于安南道途往返紀行諸詩，山川草木蟲魚人物詭異之狀，靡不具載」，且其於《交州藁》，共收詩 99 首，為諸藁中數量最多者。

13 在中國選本方面，《元風雅後集》、《元文類》、《元音》、《元藝圃集》、《石倉歷代詩選》、《宋元詩會》、《粵西詩載》、《元詩選》、《元詩別裁集》、《宋元明詩三百首》等皆選入陳孚詩。楊鐔，《元詩史》，頁 400，指出「他應該是整部三集《元詩選》之中，入選比例頗高的一人，存詩 289 首，就選錄了 208 首。」在越南漢詩選本方面，《全越詩錄》收陳孚詩二首，分別是〈江州〉之二、〈離交州與丁少保〉。選本的選與不選原就是一種批評，從陳孚詩的入選情況，亦可知其詩是受到編選者肯定的。

14 明·胡應麟，《詩藪·外編》（臺北：文馨出版社，1973），卷 6，頁 222-236，有關元詩的討論，多舉陳孚詩作為此時期佳作的代表，如歌行一類，認為其〈銅雀臺〉與趙子昂〈題桃源春曉圖〉等作，「皆雄渾流麗，步驟中程」（頁 222）；將其〈樓桑廟〉中的「亂山空北向，大火已西流」，列為「元五言律可摘者」（頁 223）；將其〈題金山寺〉、〈鳳凰山〉、〈安慶驛〉，列為元代七律的佳作（頁 224），並言「七言律虞伯生為冠，揭曼碩、陳剛中次之」（頁 233），整體而言，胡應麟認為陳孚詩在律詩、歌行方面都有突出表現，七律部分尤佳。

15 王皓，「陳孚《交州稿》與元代的中越文化交流」（成都：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2009.5），頁 15，曾針對陳孚詩被錄於史志的情形進行整理，如《安南志略》、《畿輔通志》、《廣西通志》、《貴州通志》、《汴京遺蹟志》，都收錄其詩。

16 王玫珍，〈元代異域風情詩探析〉，《人文藝術學報》3(2004.4): 71。

17 王皓，「陳孚《交州稿》與元代的中越文化交流」，頁 25-26。

下有痕如紅線耳」，¹⁸ 這種「飛頭」之事，真的是陳孚耳目所及者？如果不是，又何以會出現在陳孚的安南書寫中？此外，《交州藁》既以詩歌作為表達形式，「詩歌語言受制於對偶、聲律、音韻及規範，這些因素就和激發了詩作的生活情景一樣重要」，¹⁹ 那麼，這種表達形式對他的安南書寫究竟產生何種影響？這些問題的釐析，將有助於我們對《交州藁》的瞭解。以下擬先闡述陳孚的生平及其使交歷程，作為認識背景，接著探討《交州藁》觀看安南的視角。然後再檢視陳孚在《交州藁》這部詩集中如何敘述他的安南經驗。

二、陳孚及其使交歷程

陳孚，字剛中，號勿庵先生，²⁰ 台州臨海（今浙江省臨海市）人。《元史》將之列於儒學傳，稱其「天材過人，性任俠不羈，其為詩文，大抵任意而成，不事雕斲」。²¹ 著有《觀光稿》、《玉堂稿》、《交州稿》、《天游稿》、《桐江稿》、《柯山稿》等，²² 僅前三者存世，被合刊為《陳剛中詩集》。

至元二十二年（1285），對於陳孚而言，是具有轉折意義的一年。在此之前，南宋於他 18 歲時滅亡，身為前朝進士之子，²³ 在易代世變的混亂中，他曾出家為僧，²⁴ 似有作為守節遺民的想法。²⁵ 然而，這一年，上〈大一統

18 元·陳孚，〈安南即事〉附注，《陳剛中詩集·交州藁》（明天順四年沈琮廣州刊本），卷 2，頁 26。

19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陳引馳、陳磊譯，《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 93。

20 明·宋濂等著，《元史》，卷 190〈儒學二〉，頁 4338，僅言「陳孚字剛中，台州臨海人」，並未提及陳孚的號。清·顧嗣立，《元詩選·二集》，頁 212，有陳孚小傳，作「笏齋」，楊鐮，《元詩史》，頁 398，從之。但考之元·陳邁，〈陳孚墳志〉，《臨海墓志集錄》，頁 86，則言其「諱孚，號勿庵先生」，此為本文所據。

21 明·宋濂等著，《元史》，卷 190〈儒學二〉，頁 4339。

22 喻長霖等纂修，《浙江省台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卷 100，頁 1416，「其使安南時有《觀光》、《交州》二稿，皆紀道路所經山川古蹟」、「又有《天游》、《玉堂》、《桐江》、《柯山》等稿行世。」需要說明的是《觀光稿》是陳孚自故鄉北上大都的紀行詩，非出使安南所作。

23 元·陳邁，〈陳孚墳志〉，《臨海墓志集錄》，頁 86，「台州路臨海縣太平鄉石唐里人。考諱仍，前宋進士。」可知他的父親陳仍為前宋進士。

24 元·陶宗儀著，《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8，頁 97-98，「吾鄉陳

賦》的舉動正適切地標示出陳孚人生的一個新起點，²⁶ 27 歲的他，不但接受了蒙元統治的合法性，也選擇認同這個政權，他的舉動讓他從政治邊緣走向蒙元政權的羽翼，進而成為其官僚體制的一員。²⁷

由是，至元二十九年（1292）到三十年（1293）的安南之行，作為吏部尚書梁曾（1242-1322）的副使，使節的身分無疑更強化了陳孚的政治認同。首先，這次使越的國家使命是「問罪于交趾」。²⁸ 安南屬於中國的封貢國家（tributary states），²⁹ 但忽必烈（Khubilai Khaghan, 1260-1294）從未放棄將安

剛中先生孚，臨海縣人，國初時，嘗為僧，以避世變。一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牆上，「父執見之，曰：『此子欲歸俗也』」，清·四庫館臣，〈陳剛中詩集提要〉，《陳剛中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20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 614，對《南村輟耕錄》所錄的這項資料有質疑的，「又陶宗儀《輟耕錄》記孚少嘗為僧，題詩於父執之壁，父執知其欲歸俗，因使養髮妻之以女，其詩淺鄙，其事亦不知有無」，可知其主要針對的是題壁詩（其詩淺鄙）與題壁事（其事亦不知有無），並未及「少嘗為僧」事。目前研究者多認為陳孚「少嘗為僧」事是可信的，如楊鐮，《元詩史》，頁 398，「在宋元易代之際，他最初從隱於釋，以表示不食元粟」；楊鐮主編，《全元詩》第 18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 347，所錄的〈陳孚傳〉，亦言「元初，嘗為僧以避世亂，不久還俗」；何方行，〈陳孚詩歌論〉，《浙江社會科學》2008.6: 107，對於這項資料亦認為「陶宗儀與陳孚同為台州人，生活年代較為接近，《南村輟耕錄》又是一本嚴謹的筆記著作，所載當不為無據」。由此，本文對於《南村輟耕錄》的記載，採「少嘗為僧」事。

- 25 蕭啟慶，〈宋元之際的遺民與貳臣〉，《元朝史新論》（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9），頁 107，將這類在南宋滅亡之後，選擇隱身方外的人，列為「溫和型」遺民，並言其特色是「宋亡之後，守節不仕，或以詩詞書畫寄寓懷抱，或則家居著述，弘揚學術，或則寄身方外，以求解脫，對宋朝皆心懷忠愛，卻無激烈行動。」
- 26 元·陳邁，〈陳孚墳志〉，《臨海墓志集錄》，頁 86，「至元二十二年獻〈大一統賦〉于江淮（案：浙）行省，授上蔡書院山長。」陳孚的〈大一統賦〉雖已佚失，但觀其篇名，亦可探知此賦表達的是對蒙元政權的認同。
- 27 楊鐮主編，《全元詩》第 18 冊，頁 347，提及陳孚的宦途經歷，「至元二十九年，以翰林編修作為梁曾副使，出使安南。使還，除翰林待制，授建德路總管府治中。秩滿，請為鄉郡，特授台州路總管府治中。」
- 28 元·陳孚，《交州藁·後記》，《陳剛中詩集》（明天順四年沈琮廣州刊本），卷 2，頁 30。
- 29 蕭啟慶，〈元麗關係中的王室婚姻與強權政治〉，《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頁 255，註 13，將蒙古所征服及臣附各國的統治型態分成四類：「中央集權官僚統治」、「族產封建統治」、「間接統治」、「封貢國家」，安南在此類別中，被

南納入帝國版圖的構想，³⁰ 先後發動的兩次武力征伐，雖然都以元軍不勝而退，³¹ 安南主動內附終結。³² 然而，蒙元仍不斷提出苛刻的要求，如派駐達魯花赤（darughachi）、³³ 諭令國王親朝等，³⁴ 梁曾與陳孚此行即是告誡安南國王，必須入朝覲見。³⁵ 其次，安南接待使節的禮儀不符兩國朝貢關係的原則，如國王未親迎詔書等。³⁶ 可以發現，蒙元希冀將安南轉變為類似高麗的

劃為「封貢國家」，「指未能以武力降服，卻承認元室宗主權的各國，如安南、占城、暹國等。」

- 30 王英，「元朝與安南之關係」，頁 22，「忽必烈時期主要推行擴張政策，平定南宋之後，決定再征服東南亞地區，征服東南亞地區的首要目標是征服安南。」
- 31 蒙元帝國對於安南的「不勝而退」，無疑是戰爭的失敗，但安南既然擊敗蒙古大軍，何以又主動要求內附呢？杉山正明的說法，或可參考，其說認為「相較於那些覬覦越南的國家，不如說蒙古遠征軍在現實上其實沒有甚麼實戰的意願。他們看起來就像是敦促臣屬或來朝貢的宣傳部隊一般」、「實際上不管哪一支『遠征軍』，都是由三線、四線級的人員擔任『指揮官』。其陣容至少就陸戰部隊而言，差不多都很薄弱。就蒙古軍隊或大元汗國來講，是極為微小的規模。」參見（日）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忽必烈的挑戰：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新北：廣場出版社，2012），頁 181-182。
- 32 竹天，〈元朝與安南陳朝關係的幾個方面〉，《東南亞縱橫》1995.3: 8，「1288 年雙方戰爭結束後到元世祖死期間（1288 至 1294），安南陳朝國君陳日烜及其子陳日燁對元世祖忽必烈連年朝貢方物，從未中斷，且內附元朝。」
- 33 達魯花赤為蒙古語 darughachi 的音譯，意為鎮壓者、監臨官，握有實權，總轄監治。札奇斯欽，〈說元史中的達魯花赤〉，《蒙古史論叢》（臺北：學海出版社，1980），頁 465-466，「自漢地的眼光看，達魯花赤是疊床架屋，首長上面的首長；但自蒙古人的眼光來看，達魯花赤才是可汗派去的長官，其他不過是按照當地人的風俗習慣而沿襲的舊制度，他們都是達魯花赤的屬員和協助他的『佐貳人員』。」忽必烈於安南、高麗都派駐達魯花赤，以達到控制的目的，其地位是高於國王。明·宋濂等著，《元史》，卷 209〈外夷二〉，頁 4637-4638，安南國王陳日昺曾上表請罷達魯花赤，但未得到解決，其言「至天朝所遣達魯花赤，辱臨臣境，安能空回，況其行人，動有所恃，凌轢小國。雖天子與日月並明，安能照及覆盆。且達魯花赤可施於邊蠻小醜，豈有臣既席王封為一方藩屏，而反立達魯花赤以監臨之，寧不見笑於諸侯之國乎？」
- 34 派駐達魯花赤與國王親朝都屬於蒙元向安南多次提出的「六事」，但除了達魯花赤外，安南均未執行，所謂的「六事」參見明·宋濂等著，《元史》，卷 209〈外夷二〉，頁 4635，「一，君長親朝；二，子弟入質；三，編民數；四，出軍役；五，輸納稅賦；六，仍置達魯花赤統治之。」
- 35 明·宋濂等著，《元史》，卷 209〈外夷二〉，頁 4649，「二十九年九月，遣吏部尚書梁曾、禮部郎中陳孚持詔再諭日燁來朝。」
- 36 明·宋濂等著，《元史》，卷 190〈儒學二〉，頁 4339，「至安南，世子陳日燁以憂制

間接統治 (indirect rule)，³⁷ 安南則努力維持國家主權。身為強權政治的代表，陳孚在〈元奉使與安南國往復書〉中，表現出對蒙元王朝的強烈認同——「我大元以神武定天下，天戈所指，靡有不服。薄海內外，寸天尺地，悉歸職方。太平混一之盛，自開闢以來，未之有也」，³⁸ 其中「天戈所指，靡有不服」，更透顯了蒙古以武力威服各國的觀念。在此視域中，中國天子是天下的中心，而受冊封的安南國王則是受支配的臣屬，所以其稱「君臣之尊卑，天下之大經也。安南亦既知之。數世以來，修貢弗缺，可嘉也已」。³⁹ 這種意識型態必然影響《交州藁》對於事物的感知，如同 John Berger 所言的，「我們的知識和信仰會影響我們觀看事物的方式」，⁴⁰ 而觀看的方式則將決定眼中所見。顯然，《交州藁》正是透過這種充滿自我中心主義的框架，來組構其所感知的異域。

至於《交州藁》所記的異域之行，大致上是隨著旅程的順序，展列紀行的詩篇。透過詩題所見的地名，試將其使交路線展列如後：

(一) 自大都出發至邕州

順承門（大都）—盧溝橋—良鄉縣—涿州—易州—保定府—中山府—真定—趙州驛—臨洺驛—邯鄲—磁州—彰德—淇州—衛州—汴梁—朱仙驛—鄆陵—上蔡縣驛—蔡州—黃州—漢陽—潭州—衡州—永州—全州—靈川縣—永福縣—賓州—邕州

不出郊，遣陪臣來迎，又不由陽明中門入，曾與孚回館，致書詰日燭以不庭之罪，且責日燭當出郊迎詔，及講新朝尚右之禮，往復三書，宣布天子威德，辭直氣壯，皆孚筆也。」

37 蕭啟慶，〈元麗關係中的王室婚姻與強權政治〉，《元代史新探》，頁 233，「高麗雖然能僥倖保存其社稷，但自始至終都處於蒙元的嚴格控制之下。蒙元在高麗先駐有達魯花赤 (darughachi)，後設征東行省，督察王室，又駐有軍旅，闢有屯田、馬場，而高麗對蒙元則負有納貢、助軍、置驛、輸糧等義務。這些控制和義務，遠超出封貢制度下的宗藩關係之外。」以此觀之，忽必烈在安南設達魯花赤，亦曾要求安南納貢、助軍、輸糧，且於至元三十年立安南行省，可見其確實不滿足於雙方的封貢關係，而希冀將其轉變為與高麗相同的間接統治。

38 元·陳孚，〈元奉使與安南國往復書〉，《陳剛中詩集·附錄》（明天順四年沈琮廣州刊本），頁 5。

39 元·陳孚，〈元奉使與安南國往復書〉，《陳剛中詩集·附錄》，頁 8。

40 (英) John Berger 著，吳莉君譯，《觀看的方式》（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頁 11。

《交州藁》中記錄最詳盡的就是大都至邕州的去程路線。自九月初啓程，在以大都爲中心的站道中，陳孚走的應該是東、西、南三道中的南道驛路，據《析津志》，南道驛路是由大都（今北京）經良鄉（今河北省良鄉鎮）、涿州（今河北省涿州市）、定興（今河北省定興縣）、白塔（今河北省白塔鎮）至保定（今河北省保定市），⁴¹ 然後由西南行 90 里，經慶都（今河北省望都縣）至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縣）。⁴² 在真定之後，正南行至灤城（今河北省灤城縣）、趙州（今河北省趙縣）、臨洺（今河北省永年縣）、邯鄲（今河北省邯鄲市）、磁州（今河北省磁縣）、彰德（今河南省安陽縣）、淇州（今河南省淇縣）、衛州（今河南省衛輝市）。⁴³ 抵達汴梁（今河南省開封市），再由正南行經鄴陵（今河南省鄴陵縣）、上蔡（今河南省上蔡縣）、蔡州（今河南省汝南縣）、黃州（今湖北省黃岡市）。⁴⁴ 其後再由潭州（今湖南省長沙市），過衡州（今湖南省衡陽市）、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全州（今廣西省全州縣）、靈川縣（今廣西省靈川縣）、永福縣（今廣西省永福縣）、賓州（今廣西省賓陽縣）至邕州（今廣西省西寧市）。由上可知，去程所使用的是蒙元帝國境內的驛路系統，⁴⁵ 走陸路，穿越中書省、河南江北行省、湖廣行省，十二月下旬抵達邕州。

（二）自邕州出發至安南

邕州—江州—思明州—思凌州—祿州（安南境內）—丘溫縣—支陵驛—

41 元·熊夢祥，〈天下站名〉，《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頁 124，「（西南七十）良鄉，（六十）涿州，（七十）定興，（六十）白塔，（六十五）保定。」

42 元·熊夢祥，〈天下站名〉，《析津志輯佚》，頁 124，在保定之後，「至此分為二路：一路西南行九十由慶都至真定。一路正南行由蠡州至大名。」

43 元·熊夢祥，〈天下站名〉，《析津志輯佚》，頁 124-125，自真定之後，分成二路，「一路正西行由獲鹿至平陽。一路正南由灤城直至懷孟。」對照《交州藁》的詩題，其所行者應是後者，其路線為「（正南七十五）灤城，（四十五）趙州，（七十五）栢鄉，（七十）內丘，（正南偏西五十五）順德，（七十五）臨洺，（七十）邯鄲，（七十）磁州，（七十）彰德，（七十）宜溝，（七十）淇州，（七十）衛輝。」

44 元·熊夢祥，〈天下站名〉，《析津志輯佚》，頁 126-127，自汴梁分四路，對照《交州藁》的詩題，其所行者應是「一路正南由朱僊迤里東南至蘄州」者。

45 李漫，《元代傳播考——概貌、問題及限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 54，「元代的驛站功能除了『通達邊情，布宣號令』之外，也接待過往使臣，運送物資，所以其功能較廣」，可知接待使臣亦是元代驛站的功能之一。

朝地驛—橋市驛—安南（大羅城）

進入邕州，⁴⁶ 陳孚走的是忽必烈兩次出兵安南的軍事用道，這也是蒙元對安南遣使最常使用的路線。⁴⁷ 此道是由邕州，經江州（今廣西省崇左市）、思明州（今廣西省寧明縣）、思凌州（今廣西省寧明縣），進入安南國境後，過祿州（今越南祿平縣）、丘溫縣（今越南諒山市）、支陵驛、朝地驛、橋市驛，在正月二十四日至大羅城（今越南河內市）。其中安南境內的支陵驛、朝地驛、橋市驛等驛寨，皆為蒙元帝國所設，「自永平入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屯軍三百」，⁴⁸ 藉此確保對安南的掌控。

（三）自安南出發至大都

安南（大羅城）—老鼠關—柳州—永州—衡山縣—湘陰縣—安慶府—采石
陳孚於三月十五日出發返國，《交州藁》於回程的詩作為數不多，包括返京所寫的〈交州使還感事〉二首，僅 13 首，路程也只標示至途中的采石（今安徽省馬鞍山市），但仍可看出回程與去程是不同的路線，如詩題的〈泊安慶府呈貢父〉，以及詩句中的「萬里歸來一葉舟」、「回雁峰前一棹孤」、「三生帶得煙波福，又泛瀟湘過洞庭」等，⁴⁹ 都顯示回程走的是水路，沿著長江而下，經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衡山（今湖南省衡山縣）、淮陰（今江蘇省淮安市）、安慶（今安徽省安慶市）至采石。

大致而言，陳孚的安南之旅於至元二十九年（1292）九月離開大都（今

46 除邕州在內的廣西道外，另有廣東道與雲南道，明·鄧鐘，《安南圖誌》（《四部叢刊續編》第 27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頁 27，「入交之道，一由廣西，一由廣東，一由雲南。廣東則用水軍伏波以來皆行之，廣西道，宋行之，雲南道，元及我朝始開。」可知入交之道，自馬援以來用水軍征交，多走廣東道；廣西道是宋代入交使用的路線；雲南道則始自元憲宗七年，兀良合台征服大理後，率軍南征安南，此道才開啟，元明二代皆曾使用。

47 張金蓮，〈略論元代的中越交通〉，《蘭州學刊》2006.3: 43，「無論是軍事戰爭，還是和平遣使時期，交邕道路都是元與安南來往的主要通道。」虞坤，「元代廣西對外交通研究」（南寧：廣西民族大學專門史碩士論文，2011.5），頁 39，表 4-1，將元代對安南遣使及遣使路線進行整理，包括陳孚在內，計有七次遣使是由邕州入安南。

48 明·宋濂等著，《元史》，卷 209〈外夷二〉，頁 4644。

49 分見元·陳孚，〈至永州〉、〈迴衡山縣望南嶽呈御史完顏正夫修撰龐夷簡〉、〈迴過湘陰縣〉之三，《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 2，頁 28、29。

北京），沿著驛路南行，隔年元日到思明州（今廣西省寧明縣），正月二十四日方至其國，停留五十二日，於三月十五日告別當地，並在同年九月使還回京，⁵⁰ 總計歷時一年。值得注意的是這趟單程「約一百一十五驛，計七千七百餘里」⁵¹ 的漫長旅行，亦是一種跨越（transgress）地理與文化疆界的行為。

三、《交州藁》觀看安南的視角

《交州藁》是由 108 首安南紀行詩所組成的，卷末有作者後記，交代使交的緣由、時間與成果。全書的內容可概分為三：第一部分敘述國境內的旅程，以大都外城南面的順承門為起點，行至中國與安南的邊境，收詩 78 首。第二部分進入安南國境，以文字描繪異域見聞，收詩 17 首，其中五言排律〈安南即事〉，在詩歌文本外，亦以附注的形式，對安南的風物人情進行知識性的說明。第三部分則為回程的紀行詩，收詩僅 13 首。

檢視《交州藁》，可以發現，對於陳孚而言，安南應該不僅僅是單純地理學意義上的地點，他對安南的書寫從不侷限於抵達之後的觀看，事實上，在中國境內與回程的旅行中，安南也一直存在於他的視域中。究竟在這趟旅程中，陳孚如何觀看安南？這是本文嘗試解讀的。試將其主要採用的視角，分述如後：

（一）帝國之眼

1. 展示帝國威權

作為蒙元帝國的使節，無可否認，陳孚是帶著國族優越感來經驗異地的，這也使得他的安南書寫流露出強烈的帝國心態（imperial mentality）。以《交州藁》的命名為例，如果「命名是權力——稱謂某物使之成形、使隱形事物

50 有關陳孚旅程的日期，參見其《交州藁·後記》，《陳剛中詩集》，卷 2，頁 30，「至元壬辰秋九月朔，詔命吏部尚書臣梁曾、禮部郎中臣陳孚，奉璽書問罪于交趾。越翌日，召至便殿，賜金符、襲衣、乘馬、弓矢、器幣，諭遣之。明年正月二十有四日至其國，三月望日，世子陳日燭遣陪臣明字陶子奇、奉旨梁文藻等奉表請命。以九月至京師，行李之往來及期，凡駐偽境五十有二日。」

51 明·宋濂等著，《元史》，卷 63〈地理志·安南郡縣附錄〉，頁 1580，其所指的是「自安南大羅城至燕京。」

鮮明可見、賦予事物某種特殊的創造性力量」，⁵² 那麼「姑即道中所得詩一百餘首，目之曰《交州藁》」，⁵³ 其實就是一種意義的賦予。

在這本詩集中，「安南」、「交趾」、「交州」指的都是相同的所在，使用次數最多的是「交州」，然後依序為「交趾」、「安南」。⁵⁴

「安南」之稱源自唐代的安南都護府，⁵⁵ 但在南宋作為國名使用時，指的是主權獨立的國家，⁵⁶ 元代亦沿用。⁵⁷ 「交趾」為古名，在漢代之前屬於自主的政權，「漢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⁵⁸ 將之納入中國的郡縣，成為交趾郡。北宋初年，脫離北屬時期後，亦曾稱之交趾國。⁵⁹ 一般認為，「名為交趾時，是在中國統治下，名為安南時則比較自主」。⁶⁰ 相較之下，所謂的「交州」，則是「東漢建安八年（203），改交趾刺使部為交州」，⁶¹ 使

52 此為段義孚之說，轉引自（美）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公司，2006），頁 155。

53 元·陳孚，《交州藁·後記》，《陳剛中詩集》，卷 2，頁 30。

54 「交州」於《交州藁》中，共出現八次，分別是集名《交州藁》，詩題〈交州使還感事〉，詩句「瘴烟蠻雨交州客」、「交州何在海溟溟」、「陳子使交州」、「交州正月已青梅」、「關山迢遞古交州」（集句）、「睠彼交州域」。「交趾」於《交州藁》中，共出現七次，分別是詩題〈交趾境丘溫縣〉、〈二月三日宿丘溫驛見新月正在天心衆各驚異因詩以記之〉、〈交趾支陵驛即事〉、〈交趾朝地驛山名即事〉、〈交趾橋市驛戲作藥名詩〉、〈交趾偽少保國相丁公文以詩餞行因次韻〉，詩句則有「正月至交趾」、「安南」於《交州藁》中，出現兩次，僅見於詩題，為〈入安南以官事未了絕不作詩清明日感事因集成十絕奉呈貢父尚書并示世子及諸大夫篇篇見寒食〉與〈安南即事〉。

55 明·鄧鐘，〈安南考〉，《安南圖誌》，頁 3，「唐置都護府改為安南。」

56 陳荊和編校，《大越史記全書》（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刊行委員會，1984），卷 5〈本紀〉，頁 324，「遣使聘于宋，宋封帝為安南國王」；黃世杰、楊楮，〈交趾政治圖式變遷軌迹考〉，《廣西民族大學學報》36.3(2014.5): 130，「宋朝淳熙二年（1174），宋朝冊封李英宗為安南國王，改交趾國為安南國。自此後中國冊封其稱號即定為安南國王，歷安南陳朝、黎朝不變。」

57 陳荊和編校，《大越史記全書》，卷 5〈本紀〉，頁 342，「元封帝為安南國王，賜以西錦三，金熟錦六。」

58 明·鄧鐘，〈安南圖說〉，《安南圖誌》，頁 1。

59 宋·趙汝适著，馮承鈞校注，《諸蕃志校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卷上，頁 1，即稱之「交趾國」。

60 李兆良，《坤輿萬國全圖解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頁 38。

61 黃世杰、楊楮，〈交趾政治圖式變遷軌迹考〉，《廣西民族大學學報》36.3(2014.5): 130。

用此名時，其完全屬於中國地方行政制度的一環，如「漢交州七郡，歲舉孝廉，與中州齒。」⁶² 由上可知，陳孚以「交州」命名詩集，應是有意的選擇。而〈安南即事〉所稱的「睽彼交州域，初爲漢氏區」，⁶³ 以及附注「安南本漢交州，唐立都護府」，⁶⁴ 也都清楚顯示，《交州藁》中的「交州」並非單純地、中立地意指一地，而是被視爲中國的領地（territory）。相較於元代其他使越使節詩多使用安南之名，如張顯卿（生卒年不詳）的「安南雖小文章在，未可輕談井底蛙」、⁶⁵ 杜與可（生卒年不詳）的「天詔飛來彩鳳啣，繡衣持節使安南」、⁶⁶ 傅若金（1303-1342）的「冬入安南國，雲迎使者輶」、⁶⁷ 蕭泰登（1265-1303）的「從此安南成樂土，小心長與戴堯天」、⁶⁸ 黃常（生卒年不詳）的「奉使安南駐薛林，漫勞國主饋兼金」⁶⁹ 等，可知《交州藁》的命名與集中「交州」使用次數之多，應非偶然，而是陳孚意圖利用這種方式，將安南納爲蒙元帝國的「己域」。

此外，《交州藁》將安南的統治政權以「僞」來標記，如「凡駐僞境五十有二日」、「陳本閩人，有陳京者，僞諡文王」、「李氏僞諡慈順太后，龍翰女也」、「當國二人，其叔僞太師陳啓，弟僞太尉陳曄」等；又將安南國王稱之爲「酋」，如「今酋之妻，其叔興道女也」、「至酋所居門曰『陽明門』」、「官屬各以一口獻其酋，十六日開宴酌之」、「又有涅字于胸，曰義以捐軀，形於報國，雖酋子姪亦然」等，⁷⁰ 這種刻意貶抑對方國格的作法，卻也同時展現了蒙元具有支配安南的霸權，正當化中國的優越地位，其中的帝國心態，不言而喻。

62 元·程鉅夫，〈安南志略序〉，《安南志略》，頁2。

63 元·陳孚，〈安南即事〉，《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2，頁18。

64 元·陳孚，〈安南即事〉附注，《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2，頁18。

65 元·張顯卿，《安南志略》，頁393。

66 元·杜與可，〈奉使安南〉，《全元詩》第25冊，頁277。

67 元·傅若金，〈臘日入安南〉，《傅若金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卷4，頁84。

68 元·蕭泰登，〈即席和世子韻〉，《全元詩》第22冊，頁74。

69 元·黃常，〈使安南卻金〉，《全元詩》第36冊，頁146。

70 分見元·陳孚，〈交州藁·後記〉，《陳剛中詩集》，卷2，頁30；〈安南即事〉附注，《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2，頁18、20、21、18、22、21、23。

2. 將安南他者化

陳孚對安南的他者化主要出現在往返安南的國境內旅行中，他將內心的恐懼投射於安南這一客體，「利用他們擔任『負極』，成為遭受貶抑或厭惡的部分」。⁷¹事實上，在離開大都之後，陳孚最常提及的身體動作就是「回首」，剛出大都的順承門，是「嶺海孤臣天咫尺，五雲回首是都門」；過涿州時，是「回首太行青未了，不知身在涿州南」；穿越邊境的三花嶺，則是「嶺頭一回首，何處是京華」，⁷²可以發現，無論身在何地，他總是會被召喚牽引，無一例外地回首，尋找京城的方向。

這種對於京城的永恆懷望，與古代中國的世界觀有密切關係。當時的中國人普遍認為「大地彷彿一個棋盤一樣，或者像一個回字形，四邊由中心向外不斷延伸，第一圈是王所在的京城，第二圈是華夏或者諸夏，第三圈是夷狄」、「在這個『天下』中，地理空間越靠外緣，就越荒蕪，住在那裏的民族也就越野蠻」，⁷³毫無疑問，這並不是實際的地理區位，而是一種觀念的世界，然而，長久以來，這種觀念卻支配了中國人對於世界的認識，陳孚當然也不例外。當他離開京城，就感覺自己自中心往外圈移動，由華夏／諸夏而邊疆，經歷不同層次的中國，在江州時，「司馬琵琶昔日歌，天涯流落事如何。若行今日江州路，應是青衫淚更多」，⁷⁴認為自己所在的江州遠比白居易（772-846）的江州更遙遠，⁷⁵過永州時，言「昔日愚溪何自苦，永州猶未是天涯」，⁷⁶被貶謫的柳宗元（773-819）曾視愚溪為世界的外緣，但今日看來，愚溪所在的永州恐怕仍未是天的邊際，在〈過牂牁江〉中則這樣說道：

青草風吹毒霧腥，交州何在海溟溟。牂牁已恨天涯遠，又過牂牁二十

71 (英)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5），頁 82。

72 分見元·陳孚，〈出順承門〉、〈涿州〉、〈度三花嶺〉，《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 2，頁 1、14。

73 葛兆光，《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頁 37。

74 元·陳孚，〈江州〉，《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 2，頁 14。

75 陳孚這趟安南之旅所到的是嶺南的江州，即北宋時期的羈縻州，今廣西省壯族自治區崇左市，而白居易的江州則在今江西省九江市，二者只是同名。

76 元·陳孚，〈永州〉，《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 2，頁 10。

程。⁷⁷

首句寫的是眼前之境，風吹青草，身上絞繞的卻是帶有腥味的毒霧，然而，這「已恨天涯遠」的牂牁江還不是最遠的一站，即便「又過牂牁二十程」，交州卻還在未知的遠方。在以「向心」作為文化空間結構的古代中國，「一切最好的東西（人與產品）都要向中心流動，在中心發展」，⁷⁸ 所以陳孚總是從外圈向內觀看，不斷「回首」京城，而由「中」而「四方」，他總有漂流天涯的感覺，如度摩雲嶺至思凌州時，他就曾慨嘆——「對此停鞭空自慨，吾獨何為在荒裔」，⁷⁹ 而位居更外圈的安南，在他的意識中恐怕只會更壞，不會更好。可以發現，在真正到達安南之前，陳孚已將安南他者化了。

然而，在離開安南之後，陳孚在回程中亦屢屢提及安南，如〈老鼠關〉：⁸⁰

77 元·陳孚，〈過牂牁江〉，《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2，頁13。

78 唐曉峰，《從混沌到秩序——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論》（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231。

79 元·陳孚，〈度摩雲嶺至思凌州〉，《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2，頁15。

80 「老鼠關」一地，有學者認為是嶺南「鬼門關」的異稱，如楊天保，〈地名·歷史·觀念——基於嶺南鬼門關稱謂流變史的文化學解讀〉，《廣西民族研究》2007.2: 160，「及於元朝，沿襲繼往，在『鬼門關』之外，又新生『老鼠關』之類的戲謔」，並以陳孚〈老鼠關〉一詩為例，認為「老鼠過關，千夫所指！較之生入『鬼門』，更多活罪！不過，此戲稱來去匆匆，未成氣候」，依其說，將「鬼門關」戲稱為「老鼠關」者，僅陳孚一人，何以如此呢？周如月，〈古代嶺南「鬼門關」考〉，《廣西地方志》2009.3: 45，註2，亦對此感到困惑，所以不認為「老鼠關」屬於「鬼門關」的異稱之一，「此稱只在陳孚詩中曇花一現，只是個人稱呼，不能作為一個正式的名稱」。嶺南的「鬼門關」在今廣西省壯族自治區玉林市北流縣西，蒙元時期屬於中國境內，如依此說，將會影響此詩的判讀。事實上，《安南志略》，卷4，頁87，記忽必烈第二次攻安南，「西兵破支凌隘，即老鼠關」，元人「凌」、「陵」通用，如「思陵州」，《交州藁》即作「思凌州」，又對照《元史》，卷209〈外夷二〉，頁4647，對此役的紀錄，西路的程鵬飛等人，「經老鼠、陷沙、茨竹三關，凡十七戰，皆捷」，可知「老鼠關」應為「支陵驛」，而非嶺南的「鬼門關」。如依陳孚入安南後的路線，過祿州、丘溫縣、支陵驛、朝地驛、橋市驛，才到大羅城，「支陵驛」應仍在安南國境內。又陳孚，〈安南即事〉，《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2，頁24，「鼠關林翳密，狼塞濁縈紆」的附注，「丘溫東南行十數里，陟岡度嶺。西山行，兩山間，初所見黃茅修竹，既而深林茂樹，水深不盈尺，然周遭百折，或百步一涉，或半里一涉，凡六七十。復度一嶺，夾道皆古木蒼藤，有巨石挺出，篁竹叢薄，最為嶮，名老鼠關」，亦可證之老鼠關的位置應在安南國境，過丘溫縣之後。故本文將〈老鼠關〉判讀為回程中於安南國境之作，而詩中

春風又送使旌還，咲掬清波洗瘴顏。從此定知身不死，生前先過鬼門關。⁸¹

這首詩寫的是返國的喜悅，起筆明快，「咲」字點出歸情的歡樂，在欣喜之餘，他回顧此行的艱辛與「上有浮雲下有泉，萬丈高崖」⁸²的老鼠關，忽然有九死一生的感覺，故言「從此定知身不死，生前先過鬼門關」，在這裡，安南被視為猶如鬼門關的恐怖之地。

自安南歸來後，這種逃離險地的感覺，不時浮現於陳孚的回憶中，如「已幸歸來身復在，夢回猶覺瘴魂驚」、「舊夢未迷天祿閣，新愁猶憶鬼門關」，⁸³可知陳孚不但將安南「異化」(estrangement)，且強調他者的威脅性，這除了是對於外圍蠻夷的恐懼，亦與當時兩國之間戰爭一觸即發的形勢有密切關係，⁸⁴因為置身其中的使節，極可能會被出使國拘留，蒙元初期就發生多次使節被拘留的事件，如元憲宗七年(1257)安南國王陳日昞(1218-1277)曾將兀良台(1200-1271)的使節投入獄中，⁸⁵郝經(1223-1275)於中統元年(1260)以元使身分出使南宋，亦被拘留了十六年；⁸⁶而蒙元亦曾多次扣

提及的「鬼門關」只用其意而非實指。

81 元·陳孚，〈老鼠關〉，《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 2，頁 28。

82 (越南)吳時仕，〈支稜驛〉子注，《吳黃甲詩集》(越南國家圖書館藏本，館藏編號 R.642·NLVNP-0679)，頁 8。此處的支稜驛即支陵驛。

83 分見元·陳孚，〈交州使還感事二首〉之二、〈泊安慶府呈貢父〉之二，《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 2，頁 30、29。

84 明·宋濂等著，《元史》，卷 209〈外夷二〉，頁 4649-4650，「三十年，梁曾等使還，日燿遣陪臣陶子奇等來貢。廷臣以日燿終不來朝，又議征之，遂拘留陶子奇於江陵」；陳荊和編校，《大越史記全書》，卷 5〈本紀〉，頁 370，對此亦有記載，「元留子奇於江陵，立安南行省，以平章事劉二、拔都等總兵屯江候征進。明年正月，元世祖崩，成宗立，詔罷兵，放子奇還國。」可知由於安南國王不願入朝，隨陳孚等人至蒙元朝貢的安南使臣陶子奇因而被拘留，蒙元欲設安南行省，並有再度征伐安南的計畫，隔年忽必烈去世，元成宗即位，才下令停止戰爭準備，罷征安南。

85 明·宋濂等著，《元史》，卷 209〈外夷二〉，頁 4633，兀良台當時奉忽必烈之命留守雲南，欲對安南招諭，「先遣使二人往諭之，不返。」

86 明·宋濂等著，《元史》，卷 157〈郝經傳〉，頁 3708-3709，記郝經被賈似道扣留於真州十六年，「居七年，從者怒鬪，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帝遣禮部尚書中都海牙及經弟樞密院都事郝庸入宋，問執事人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

留安南的使節，⁸⁷ 此種置身險境的危險與不定顯然強化了陳孚眼中安南的威脅性，讓恐怖之地的黑暗更加深沉。

（二）獵奇之眼

通過獵奇之眼，展現異域的異質（heterogeneous），原就是旅行書寫常見的視角，陳孚亦不例外，真正進入安南國境，他就不再計算走了多少路程，對於一切來到眼前的事物，陳孚什麼都看，努力消化著陌生的奇觀，《交州藁》於是充滿著這種有關異地異事的紀錄。

在《交州藁》講述的奇觀中，天象物候之異被重複地強調。如「九月出薊門，北風吹雪衣。裘溫正月至，交趾赤日燒」、「六轡南驅下寶臺，交州正月已青梅」，⁸⁸ 可知九月離開居庸關時，旅行者必須以雪衣禦寒，可是明明應該比九月更寒涼的正月，古名交趾的安南卻是赤日延燒。而當帝國使者抵達當地的寶臺山時，正月的安南竟已進入了青梅季。〈二月三日宿丘溫驛，見新月正在天心，衆各驚異，因詩以記之〉更直接道出對於這種異地奇觀的驚異：

至元癸巳春，二月三日夕。陳子使交州，弭節丘溫驛。雲開林影明，出門看月色。但見天中間，彎彎貼半壁。同行二三子，相顧各太息。中原月初生，去地纔數尺。今胡翹首望，月乃在東北。神禹奠九州，維此實異域。玄象尚爾殊，禮義何由識。太息不能寐，風動松露滴。亂星不知名，纍纍擁南極。⁸⁹

這首詩題已表明讓陳孚與同行衆人驚異的奇觀是「新月正在天心」。因為二月初三的眉月（waxing Crescent moon），⁹⁰ 「中原月初生，去地纔數尺。今胡翹

87 陳荊和編校，《大越史記全書》，卷 5〈本紀〉，頁 352，記至元十五年（1278），蒙元要求安南國王入朝，「帝不聽，遣鄭廷瓚、杜國計如元，元留廷瓚，不遣還」；卷之 5，頁 370，「元遣兵部尚書梁曾，諭帝入見。帝辭以疾，遣陶子奇遣以方物。元留子奇於江陵。」可知蒙元亦曾多次拘留安南使節。

88 分見元·陳孚，〈交趾境丘溫縣〉、〈交趾支陵驛即事〉，《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 2，頁 15、16。

89 元·陳孚，〈二月三日宿丘溫驛見新月正在天心衆各驚異因詩以記之〉，《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 2，頁 15-16。

90 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編，《天文年鑑 2009》（臺北：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2010），頁 6，「朔（New Moon）：即新月，新露微光，為農曆月之始，曆法上規定朔日為初一」、「新月之後細如眉型之月，初三至初五的月相，皆可稱為眉月」，可知陳

首望，月乃在東北」，這和中原不同的天象，讓他發出「神禹奠九州，維此實異域」之歎，由天象之異，呼應著古代中國的世界觀——「由『中』而『四方』，文明程度遞減，因此與四方夷狄不足以論王道」，⁹¹ 所以稱「玄象尚爾殊，禮義何由識」。陌生而未開化的異域，使旅行者不由得歎息且難以入睡。

除了天象物候外，陳孚亦將異域風俗與動植物之屬作為奇觀主軸，比如在〈安南即事〉中，有記安南人「尊卑雙跣足，老幼一圓顱」，附注言「民皆徒跣，間有躡革履，至殿則去之。郊迎之際，袍笏百人，皆跣而已。男子悉髡，有官則以青巾冪之。民悉僧也」，展現安南人在服飾上與中國人不同的赤足與髡髮；在「龍葵常穿壁，蔓藤不離盂」的附注中，則詳述安南與閩廣嚼食檳榔之俗，「閩廣人檳榔皆啗乾者，以蔓藤石灰和之。交人惟啖軟檳榔，取新採嫩者，以蔓葉二寸，塗蜆灰裹而食。貴者以黃銀槌，僅攜之不離左右，終日咀嚼不少休」，⁹² 這些不同於中國的奇風異俗，標示他進入了一個陌生的異質世界。

這種異國風情亦展現於有關熱帶事物的紀錄，如記安南果品的「牛蕉垂似劍，龍荔綴如珠」，附注言「芭蕉極大者，冬不凋，中抽一榦，節節有花。花重則榦為所墜。結實下垂，一穗數十枚，長數寸，如肥皂，去皮，軟爛如綠柿，極甘冷，一名牛蕉。龍荔實如小荔枝，味如龍眼，木與葉亦相似」，另有奇菓、人面子、椰子、盧都子、餘甘子等，皆「味絕甘」、「珍味可食」，⁹³ 從視覺與味覺，營造出奇觀氛圍。

可以發現，在進入安南國境之後，陳孚積極地展示各種奇觀作為安南旅行的見證，其中有自然景觀，亦有文化景觀，通過這些奇觀場景的建構，強化陌生感，安南於是成為不同於在地家園的異域。

孚於農曆二月初三所見的「彎彎貼半壁」的月亮，應是眉月。不過在古代中國，新月與眉月似未有清楚的界分。

91 唐曉峰，《從混沌到秩序——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論》，頁 231。

92 分見元·陳孚，〈安南即事〉、〈安南即事〉附注，《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 2，頁 18、19、23。

93 分見元·陳孚，〈安南即事〉、〈安南即事〉附注，《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 2，頁 25-26。

四、《交州藁》的書寫模式

作為文學書寫，《交州藁》如何透過文字再現使節／旅行者所見所感的異域安南，這是值得關注的論題，田曉菲曾指出，「中國的詩歌研究太多注意於詩歌生產的語境而較少注意到詩歌文本本身，注意詩歌說什麼而不是怎麼說」，⁹⁴ 由此，本文希冀將焦點放在《交州藁》再現安南時，主要採取的書寫模式，也就是怎麼說的問題。

（一）熟稔化的修辭策略

《交州藁》中的安南紀行詩多採用一種直接的、具體的描述，從外在的現實裡，提煉出感受最深刻的部分，並且按照時間順序來記錄。然而，以文學文本作為媒介，即便是表面看來透明的敘述背後，都有書寫者的意識形態在運作，尤其是其所借助的修辭策略，因為「修辭遠不僅僅是被動的賣嘴皮子的力量，而是主動地以其創造的範式，以其描述的詩學和經典的規範觀念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它也以其付出的本能般的唇緣服務（lip-service）植入了看待世界的各種方式範圍」，⁹⁵ 《交州藁》於此，採用的是異域書寫常見的熟稔化修辭策略，⁹⁶ 也就是挪借中國文化傳統中常見的典故成辭來表述作者所感

94 田曉菲，《神游：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北京：三聯書店，2015），頁 218。

95 Jonathan P. A. Sell, *Rhetoric and Wonder in English Travel Writing, 1560-1613*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 9. 譯文轉引自張德明，《從島國到帝國——近現代英國旅行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頁 55。

96 「熟稔化的修辭策略」一說參見田曉菲，《神游：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頁 223-224，意指「詩歌以熟悉的、為詩人提供了觀看世界之基本空架的修辭和意象，對異域做出反異化」，並認為「『熟稔化』這一修辭策略自有正面意義：詩人以熟悉可解的語彙把異域呈現給本土讀者，以此為異域賦予人性，使其親切可感。但是，另一方面來說，這麼做也有抹除文化差異的危險。」田曉菲此說或是受到鄭毓瑜的啟發，鄭毓瑜發表於 2002 年的〈流亡的風景——〈遊後樂園賦〉與朱舜水的遺民書寫〉即已注意到，「個別的生活遭遇透過文體的模塑，因此參與了一個累積的公共傳統；這個文體傳統累積了世代的讀／寫經驗，提供作者印證、闡發（頁 193）；其後在探析黃遵憲《日本雜事詩》的〈舊詩語與新世界〉，更進一步指出，「如果注意到黃遵憲根本是運用中國的一套累積各種人、事、物、地所構成的典故系統去描述日

知的異域。

以詩集中常見的詞彙為例，《交州藁》在描繪自然景觀時，「蠻」、「瘴」二詞出現的頻率頗高，跋涉到帝國邊境時，已見「瘴雨飛爲塵」、「黃茅青草瘴」、「千年毒瘴鬱不消」、「風吹蠻雨滴芭蕉」、「瘴雲飛落木棉花」、「瘴烟蠻雨交州客」，⁹⁷ 進入安南之後，〈交趾支陵驛即事〉也如此描述：

六轡南驅下寶臺，交州正月已青梅。富良江湧瘴雲濕，安化橋昏蠻雨來。
蝙蝠穿林紅似燄，蜈蚣浮海黑如堆。防風猶後塗山會，終為生靈結禍胎。⁹⁸

在這首詩中，開頭兩句便直接點出安南氣候與中國的殊異，「富良江湧瘴雲濕，安化橋昏蠻雨來」，這是詩人遙想抵達大羅城會看到的景象，流經大羅城的富良江⁹⁹ 已爲低濕的瘴雲所籠罩，城中的安化橋¹⁰⁰ 則迎來昏暗的蠻雨。「蝙蝠穿林紅似燄，蜈蚣浮海黑如堆」，兩句承上而來，進一步描繪域外世界的種種異常，穿林而飛的紅蝙蝠與浮海而至的蜈蚣群，形成令人驚奇的異地奇觀，亦有福禍難測之喻。¹⁰¹ 最後兩句，則藉由防風氏後至而被誅殺的典故，警告

本，就會發現雜事詩並不是全然開放向日本或西方的現實地理記錄，反而是早有一出於自覺或不自覺的策略性的清單在手上。」（頁 315）鄭毓瑜的二篇論文請參見《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頁 193-235 與《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頁 268-324。

97 分見元·陳孚，〈賓州〉、〈度三花嶺〉、〈度摩雲嶺至思凌州〉、〈思明州〉五首之一、〈思明州〉五首之四、〈江州〉二首之二，《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 2，頁 13、14、15、14、15、14。

98 元·陳孚，〈交趾支陵驛即事〉，《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 2，頁 16。

99 （越南）未署作者，《皇越地輿志》（越南國家圖書館藏明命十四年（1833）刻本，館藏編號 R.2212·NLVNPF-0108），卷 1，頁 19，「珥河，一名瀘江，一名富良江，在大羅城之左。」

100 元·陳孚，〈安南即事〉附注，《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 2，頁 22，「自館行六十里，過安化橋復一里，至清化橋北。」可知安化橋位於大羅城中，距天使館六十里處。

101 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卷 946，頁 348，引自《水經》「交州丹水亭下有石穴，甚深，未嘗測其遠近。穴中蝙蝠大者如鳥，多則倒懸，得而服之，使人神仙」，可知交州產蝙蝠，已見文獻記載。而紅蝠因諧音的關係，又有鴻福的指稱，所以「蝙蝠穿林紅似燄」似有福至之意。蜈蚣屬於中國民間的五毒之一，清·呂種玉，《言鯖》（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卷下，頁 322-323，「古者青齊風俗，於穀雨日畫五毒符，圖蠍子、蜈蚣、蛇虺、蜂、蟻之狀，各畫一針刺，宣

安南國王必須盡早入朝，否則會為生民帶來戰爭的禍害。可以發現，「蠻」、「瘴」二詞又被用來詮釋異地的景觀。

作為形容詞彙，「蠻」、「瘴」表面看來普通，其實不然。在《禮記》〈王制〉裡，有這樣的說法：「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¹⁰²《嶺表錄異》則稱「嶺表或見異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謂之瘴母」，¹⁰³值得注意的是，「蠻」、「瘴」顯然是古代中國對於南方的固定想像——未開化的、瀰漫著致病毒霧與惡氣的地方，也就是說，「蠻」、「瘴」並不屬於美學的評價，而是一種文化的類別，書寫者把異域的景物放入文化的框架中，以「蠻」、「瘴」標示出不同於帝國的相異者，進而取代地景的描繪，這似乎已經成為古典詩語對於南方異域，尤其是安南的熟稔化修辭，如唐詩中的「瘴雜交州雨，犀揩馬援碑」、¹⁰⁴「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¹⁰⁵等，即使安南詩人亦深受影響，陳明宗（1300-1357）〈送北使撒只尾趙子期〉的「駟騎行行瘴霧深，海邊光照使星臨」、¹⁰⁶阮忠彥（1289-1370）〈丘溫驛〉的「月滿蠻村閑夜柝，雨餘野燒樂春耕」，¹⁰⁷也都以「蠻」、「瘴」來形容安南的景觀，正如鄭毓瑜敏銳的觀察，「一旦選擇某種文體，就彷彿如進

佈家戶貼之，以禳蟲毒」，所以「蜈蚣浮海黑如堆」，也就難免予人不安之感。由上可知，二句分別以色彩與物象，將作者對於此行的不安具體化。

102 姜義華注譯，《新譯禮記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97），頁 203。

103 唐·劉恂，《嶺表錄異》（《四庫全書珍本》第 35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卷上，頁 7。此外，唐·鄭熊，《番禺雜記》（《歷代嶺南筆記八種》，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頁 35，亦言：「嶺表或見有物自空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即病，謂之瘴母。」可見這種說法在唐代已非常流行，通過不斷的傳錄，遂成為有關南方的知識，如宋·陸游，《避暑漫抄》（長沙：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頁 8，即徵引《嶺表錄異》有關瘴母之說。到了元代，陳旅，〈送楊田甫巡檢之官潮陽〉，《全元詩》第 35 冊，頁 56，亦稱：「蜃丁浦口迎官艦，瘴母雲頭避使旌。」

104 唐·貫休，〈送諫官南遷〉，《禪月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084 冊），卷 7，頁 454。

105 唐·張籍，〈送南遷客〉，《張司業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078 冊），卷 3，頁 27。

106（越南）陳弱，〈送北使撒只尾趙子期〉，（越南）裴輝璧編，《皇越詩選》（越南國家圖書館藏希文堂刻本，館藏編號 R.968·NLVNPF-0086-01），卷 1，頁 5。

107（越南）阮忠彥，〈丘溫驛〉，《介軒詩集》（上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頁 22。

入歷史文化的迴廊，在一種熟悉的語句格式、典事氛圍中，完成發現當下自我同時也是再現傳統的書寫活動」，¹⁰⁸ 可知《交州藁》對「蠻」、「瘴」等詞的使用，是遵循了固定的文化傳統，透過熟悉的語句格式，將安南的經驗呈現給讀者，卻也因此植入了中國長久以來對安南所積澱的想像與偏見。

類似的情況，亦見於典故的運用，比如〈祿州遇大風〉：

岩壑驚搖木樹摧，滿空苦霧捲塵埃。黑風鬼國漂流去，赤縣神州夢寐回。
病馬不嘶毛似蝟，征夫相對面如灰。夜深不解征衣睡，況有翻盆急雨來。¹⁰⁹

所謂「黑風鬼國」明顯化用《妙法蓮華經》的「入於大海，假使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¹¹⁰ 指涉中國之外的異域，但其原出處卻是食人惡鬼的聚居地，而鬼國的「鬼」亦隱隱透顯出作者的焦慮不安，段義孚指出，「與其他民族一樣，不論什麼東西，只要看上去有些陌生和怪異，中國人就會對其產生懷疑和恐懼。從本源上來說，『鬼』這個字指的是樣子似人而怪異的猿，一種野生動物。隨後它的意思擴展到包括異族在內」，¹¹¹ 換言之，異域接上了鬼國的典故，就被構築成令人排拒的恐怖之地，而透過旅行者的回望——「赤縣神州夢寐回」，中國於是成為不斷夢回的美好所在。此外，《交州藁》對於馬援（14BC-49）、狄青（1008-1057）與塗山會盟事典的運用，如「鐵船波影見，銅柱土痕枯」、¹¹²「樓船征既克，徵側叛還誅」、「璽書行萬里，銅柱又千年」、「使節尋常銅柱外，天威呖尺玉階前」、「因思狄天使，貔貅夜度摧狂蠻」、「願頌聖皇如天福，早見塗山班萬玉」、「防風猶後塗山會，終為生靈結禍胎」等，¹¹³ 都是有意於他者的場域，彰顯中國的威權，因為馬援與狄青

108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頁 193。

109 元·陳孚，〈祿州遇大風〉，《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 2，頁 15。

110 晉·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臺南：和裕出版社，2010），頁 3。

111（美）段義孚（Yi-Fu Tuan）著，徐文寧譯，《無邊的恐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 104。

112 元·陳孚，〈安南即事〉，《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 2，頁 25，又同頁附注，言「馬援征徵側，造鐵船四隻沉于海，今水清猶彷彿可見。銅柱，援所立也，在乾地鋪，其刻有云：『銅柱折，交人滅』。」

113 分見元·陳孚，〈安南即事〉、〈交趾朝地驛即事〉、〈交趾偽少保國相丁公文以詩餞行因次韻〉、〈過邕州崑崙關〉、〈交趾境丘溫縣〉、〈交趾支陵驛即事〉，《陳剛中詩集·交

皆是在征越戰爭中取得勝利的名將，塗山會盟之典，則可把安南視為以中國為宗主的諸侯國。

由上可知，《交州藁》經常利用熟悉的詞彙與典故，對安南進行再現，這種熟稔化的修辭策略可以使讀者透過習以為常的概念來理解安南，也使其所使用的詩語，「不應只是透明的媒介，而其實是設定好的塑型模具」，¹¹⁴ 讓安南切合陳孚的形塑，是文化低落的化外之地，必須受中國支配的從屬國。

（二）詩注並行的博物敘事

《交州藁》中最受矚目的作品無疑是〈安南即事〉，這首五言排律不但被研究者視為《交州藁》中「絕對的異端代表」，¹¹⁵ 且是「研究越南古史及中越關係史所必讀」、¹¹⁶ 「詳言安南歷史及當時政治物產風俗等情，極具史料價值」，¹¹⁷ 越南學者 PHẠM VĂN THẨM（范文深）亦指出其對於越南陳朝（1225-1400）的政治、經濟與風俗習慣的記錄，有助於研究當時的歷史，¹¹⁸ 可知中越學者皆肯定此詩的述異特色與史料價值，然而，卻少有人注意到〈安南即事〉不同於《交州藁》中其他安南紀行詩的殊異之處，因為這首詩並非單純的紀行詩。

首先，在詩歌形式方面，〈安南即事〉選用的是五言排律的體式，詩注並行，在《交州藁》中僅此詩為五排且具附注。律詩是「一種高度格律化的詩歌形式」，¹¹⁹ 為求整齊化與音樂性，在平仄、對仗、押韻上原就有嚴格的限制，排律則是「將律詩的對句部分加以擴大、充實的詩型，而且除了冒頭的兩句（一聯）和末尾的兩句（一聯）為散句以外，其他部分都以對句構成」，¹²⁰ 〈安南即事〉是包含首尾兩聯在內，共 51 韻 102 句，全都兩兩對仗，

州藁》，卷 2，頁 18、16、28、13、15、16。

114 鄭毓瑜，〈舊詩語與新世界〉，《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頁 287。

115 王皓，「陳孚《交州稿》與元代的中越文化交流」，頁 20。

116 楊鐮，《元詩史》，頁 399。

117 馬明達，〈元代出使安南考〉，《中外關係史論叢》第 6 輯（鄭州：大象出版社，1999），頁 279。

118（越南）范文深，〈安南即事之介紹〉，《漢喃雜誌》2008.3: 64。

119 高友工著，黃寶華譯，〈律詩的美學〉，《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 209。

120（日）松浦友久著，黃仁生譯，〈「七言排律」不盛行的原因——從對偶表現的本質說

顯然，陳孚有意透過這種精美的長篇體式來炫才，因為「排律尤其是長篇排律是顯示大才華的詩體」，¹²¹ 而五排更是科舉試帖詩最常使用的體式，以此為之，作者的用心不言可喻，事實上，陳孚在詩末即明白揭示「沐熏陳此什，禮部小臣孚」，¹²² 也就是說，〈安南即事〉不僅是個人的旅途紀行，也是使節進獻給帝王之作。

至於〈安南即事〉詩注並行的形式，亦需留意。一般來說，附注主要是為詩歌文本服務，在此詩中，陳孚經常以數倍、甚至數十倍於原詩句的散體附注，協助讀者理解詩作的意義，如「陟嶠輕于鹿，泐波疾似鳧」，¹²³ 以鹿之輕、鳧之疾，比擬安南人於山上水中，往來行動的輕快敏捷，附注言「足皮厚甚，登山如飛，芒刺悉無所懼。父子男女同川而浴，冬夏皆然。善水，有潛行數百里者」，¹²⁴ 詩注對照，「登山如飛」應是相應於「陟嶠輕于鹿」，卻增添「足皮厚甚」、「芒刺悉無所懼」的細節；「善水」是「泐波疾似鳧」的說明，也多了「父子男女同川而浴，冬夏皆然」、「有潛行數百里者」的風俗記載，可以發現，高度精煉的詩句雖有利於意象經營與節奏安排，卻無法詳細的記敘異域見聞，因而必須利用散體附注提供更多的細節與資訊，才能有效地傳達出作者所感知的安南。

其次，在內容與敘寫方面，〈安南即事〉以精煉的詩句與詳盡的散體附注，闡述安南的歷史、儀典、習俗、服飾、語言、交通、建物、樂舞、神祇、名勝、軍事、職官、賦稅、物產、地形、水文、異物、異人、異事等事項，其記敘方式主要有二種：

1. 地理書式的記敘方式

〈安南即事〉對安南的記敘，主要承繼《禹貢》以來的地理書，¹²⁵ 遵循「州郡及縣分野封略事業，國邑山陵水泉，鄉亭城道里土田，民物風俗，先賢

起》，《中國文學研究》2002.4: 41。

121 沈文凡，〈唐代「排律」詩體的隔代及域外之名稱確立初探——圍繞明代及韓國的排律創作與評論展開〉，《新疆師範大學學報》26.3(2005.9): 107。

122 元·陳孚，〈安南即事〉，《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2，頁28。

123 元·陳孚，〈安南即事〉，《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2，頁19。

124 元·陳孚，〈安南即事〉附注，《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2，頁19。

125 王琳，〈六朝地記：地理與文學的結合〉，《文史哲》2012.1: 94，「地記或名地志、地理書，主要用來記敘某地疆域、山川、道里、古迹、風俗、物產等方面的情況。」

舊好，靡不具悉」¹²⁶的模式，所以詩句無法詳細記敘的，就必須以散體附注補充，如記名勝的「寺號千齡陋，州名萬劫愚」，即以附注說明千齡寺的位置、由來與建成時間，也詳述萬劫州之得名、古稱以及其時受封的藩王。又如詩中稱當地的語言是「語笑堂前燕，趨檣屋上鳥」，¹²⁷附注不但舉出「謂天曰『勃未』，地曰『烟』，日曰『扶勃未』，月曰『勃叉』，風曰『教』」，等 18 個用漢字記音的例子，還描述這種語言聽起來「聲急而浮，大似鳥語。趨進輕佻，往來如風」，¹²⁸詳細記錄了他的親身觀察（observation）。如果「地理書所記之物產、貢賦、地俗、妖祥，始終都屬於經世致用的範疇，目的是在為統一的帝國進行考察，除了以備皇帝的諮詢外，也象徵對天下宣示王權」，¹²⁹顯然〈安南即事〉就是陳孚為蒙元帝王提供的安南考察，回應著忽必烈長久以來想將安南收入帝國版圖的期望。

2. 異物志式的記敘方式

〈安南即事〉最引人注目之處，就是詩中出現許多超出常理的「異象」，如記安南人「鼻飲如瓠甌，頭飛似轆轤」，附注言「習以鼻飲，如牛然，酒或以小管吸之。峒民頭有能飛者，以兩耳為翼，夜飛往海際，拾魚蝦而食，曉復歸，身完如故，但頸下有痕如紅線耳」，¹³⁰這種難以用常理收編的特殊知識，恐怕很難視為「對安南社會的記實報導」，¹³¹而是更接近源於《山海經》的異物志式敘事。¹³²

異物志的知識有許多是源自中國的想像地理（imagined geographies），¹³³

126 唐·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33〈經籍志〉，頁 988。

127 分見元·陳孚，〈安南即事〉，《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 2，頁 20、19。

128 元·陳孚，〈安南即事〉附注，《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 2，頁 19。

129 許聖和，「博物思維與六朝文學」（花蓮：東華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6.7），頁 188。

130 元·陳孚，〈安南即事〉、〈安南即事〉附注，《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 2，頁 26。

131 王皓，「陳孚《交州稿》與元代的中越文化交流」，頁 25。

132 王琳，〈六朝地記：地理與文學的結合〉，《文史哲》2012.1: 103，「異物乃奇異的不常見的動物、植物、事物之謂也，因異於中原，故名異物」，異物志雖可歸屬於地理書，但專記異於中原的異物異事，其敘寫方式反而與記述海外怪異之物的《山海經》相近，廖秀倩，「《博物志》博物書寫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14.6），頁 54-55，即將之分流，「地理博物學本來兩大分流，即平實如《禹貢》的官方地志，與保留較多原始巫風的《山海經》。」

133（英）Joanne P. Sharp 著，司徒懿譯，《後殖民地地理學》，頁 16，認為「想像地理」是

古代的中國人認為自己位居世界的中心，在華夏／諸夏之外的外圈則處於外界（outside）的遙遠地域，對於那些只是聽聞卻從未到訪的地方，他們每每將之變形，因此想像地理的居住者幾乎都是與中國人不同的怪異種族，「在『諸國境界，犬牙相入』的狀況下，需要跨越『境界』（四境），而『去』中土逾遠，則異人、異俗、異產就成為博物之士炫奇誇異的殊方知識」。¹³⁴以「飛頭」為例，《搜神記》稱「秦時，南方有『落頭民』，其頭能飛。其種人部有祭祀，號曰『蟲落』，故因取名焉」、又言「吳時，將軍朱桓，得一婢，每夜臥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窗中出入，以耳為翼，將曉，復還」，¹³⁵《酉陽雜俎》亦有類似的記載，「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故有飛頭獠子之號。頭將飛一日前，頸有痕，匝項如紅縷，妻子遂看守之。其人及夜狀如病，頭忽生翼，脫身而去，乃於岸泥尋蟹蚓之類食之，將曉飛還，如夢覺，其腹實矣」，¹³⁶《新唐書》進而將之收入〈南蠻傳〉中，¹³⁷可以發現在南方居住著飛頭的怪異種族，似乎已成為史傳認可的異域知識。

至於「鼻飲」，最早見於《漢書》，「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¹³⁸蕭綱（503-551）〈南郊頌〉則稱「於是龍光之地，日浴之鄉，紫舌黃支，頭飛鼻飲。自西自南。無思不服」，¹³⁹到了宋代，《溪蠻

奠基於神話和傳說，並指出「或許最著名者是本章開頭所引述的《曼德維爾遊記》，該書製造的是一個文本化的世界。」同樣的，中國也存在著想像地理，如來自《山海經》、《穆天子傳》之類的博物知識所建構的異域。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頁 84，指出「古代中國關於『異域』的這些描述，並不是關於當時人對於實際世界的知識，而是對於『中國』以及朝貢體制中的『天下』與『四夷』的一種想像。」毫無疑問，這就是中國的想像地理。

134 劉苑如，〈題名、輯佚與復原——《玄中記》的異世界構想〉，《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1(2007.9): 45。

135 晉·干寶著，汪紹楹校注，《搜神記》（臺北：里仁書局，1970），卷 12，頁 151-152。

136 唐·段成式著，杜聰校點，《酉陽雜俎·前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卷 4，頁 33。

137 宋·歐陽修等著，《新唐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卷 222，頁 17447，「有飛頭獠者，頭欲飛，周項有痕如縷，妻子共守之，及夜如並頭忽亡，比旦還。」

138 漢·班固著，江建忠標點，《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卷 64〈賈捐之傳〉，頁 2001。

139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卷 38〈禮部〉，頁 683。

叢笑》談到西南邊境的「玃獠」，也如此述說——「飲不以口而以鼻，自取其便，名曰鼻飲」，¹⁴⁰ 這顯示「鼻飲」也是古代中國所熟悉的南方異聞。¹⁴¹

檢視〈安南即事〉，還有不少類似之例，比如「人能幻虎獠」，附注言「峒民有妖術，誦咒脩煉，則幻形爲虎，搏獐鹿生啗之，然不常有也」，¹⁴² 以江漢地區的獠人之說作爲比較，「江漢之域，有獠人。其先，稟君之苗裔也。能化爲虎」，¹⁴³ 「江漢有獠人，能爲虎。俗云『獠虎化爲人』。好著葛衣，其足無踵，有五指者，皆獠也」，¹⁴⁴ 可以看出二者的承襲關係。此外，「海中大魚多有之，惟海鰩最偉，小者亦數千尺，吞舟之說非虛也」、「鰐魚大者三四丈，四足，似守宮，黃色脩尾，口森鋸齒，一名忽雷，其聲如霹靂，鹿走崖上，聞其嗥吼，則怖而墜，多爲鰐所啗」，¹⁴⁵ 也都是參照《嶺表錄異》¹⁴⁶ 中的記

140 宋·朱輔，《溪蠻叢笑》（百部叢書集成《古今說海》，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頁8。

141 「鼻飲」、「飛頭」的真實與否，一直以來爭論不休，尤其有關「鼻飲」的異議是最多的。反對者，普遍認為這是對南方民族充滿貶抑的中國中心想像，如謝世忠，《中國與北東南亞的場域》（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頁220，「有些在民族誌中得不到支持證據的文化要素，諸如鼻飲、食人、七月而產、飛頭、性同禽獸，以及殺傷爲戲笑等，幾乎是荒唐無知的」。贊同者則多認為西南少數民族確有「鼻飲」的習俗，如范宏貴，〈中、越、老三國的鼻飲〉，《東南亞之窗》2007.2: 60，以越南康族的實據為證，「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之前，鼻飲在沱江沿岸的康人男子中還相當普遍。現在五六十歲上年紀的男人，還保持有此俗」。但不論「鼻飲」、「飛頭」真實與否，這些知識恐怕都經過一定程度的變形，如同 Joanne P. Sharp 著，司徒懿譯，《後殖民地地理學》（臺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公司，2012），頁16，所指出的，「怪異種族的傳說之所以延續不斷，是因為他們真的存在！透過嘴唇伸展、瑜珈等實踐，看在陌生旅人的眼中，簡直是身軀扭曲」。由此，本文認為「鼻飲」、「飛頭」即使作為特異風俗而存在，也是屬於南方少數民族的特例，而非整體的全部，但在古代中國，卻被放大變形，並被指為是南方全體的特徵，成為述異的重點，因此可列為想像地理的知識。其次，陳孚此次安南行，幾乎都留在大羅城，並未進行民族誌的觀察與探訪，附注的說明文字又多沿用之前的異物志，可知其知識的來源仍然以文本為主。

142 元·陳孚，〈安南即事〉、〈安南即事〉附注，《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2，頁26。

143 晉·干寶著，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卷12，頁152。

144 唐·李善等引《博物志》，註〈蜀都賦〉中的「晶獠氓於萋萋，彈言鳥於森木」，參見梁·蕭統編，唐·李善等註，《增補六臣註文選》（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頁96。

145 元·陳孚，〈安南即事〉附注，《陳剛中詩集·交州藁》，卷2，頁27。

載。可以發現，〈安南即事〉中收羅了許多源自中國博物傳統的南方異聞，然而，「中國古代博物傳統裡所認知的『真實』，或許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同一個傳統中的『想像』」，¹⁴⁷ 當這種想像地理的知識滲入〈安南即事〉中，讓陳孚所再現的安南多了奇幻的異國情調（exoticism）。

至此，我們可以說〈安南即事〉是使節陳孚以極盡炫才之能事的長篇五排，向蒙元帝王進獻的安南地理與文化奇觀，積極回應著忽必烈欲將安南納入帝國版圖的期望，其中有陳孚的親身經驗與直接觀察，也有源於博物知識的想像地理，由此形成紀實與想像交織的奇觀敘事，讓其有別於《交州藁》中的其他安南紀行詩，而這種帶有強烈異國風格與奇幻色彩的安南書寫在元詩中也是獨樹一格的。

五、結 論

本文以《交州藁》中的安南書寫作為聚焦重點，關注屬於文學文本的《交州藁》如何觀看與再現安南，現將研究成果展示於後。

作為《交州藁》的認識背景，陳孚的生平及其使交歷程是必須加以揭示的。身為前朝進士之子，陳孚的人生可以至元二十二年（1285）為分界，在此之前，面對易代世變的混亂，他曾出家為僧，似有成為守節遺民的想法。然而，就在這一年，上〈大一統賦〉的舉動正適切地標示出陳孚人生的一個新起點，27 歲的他，不但接受了蒙元統治的合法性，也選擇認同這個政權，進而成為其官僚體制的一員。至元二十九年（1292），當陳孚以副使的身分出使安南，毫無疑問，使節的身分更強化了他的政治認同，因為他必須充分傳達忽必烈及蒙元政權的意志，所以在〈元奉使與安南國往復書〉中，陳孚不但表現出對蒙元王朝的效忠與認同，更反映了蒙古以武力威服各國的觀

146 唐·劉恂，〈嶺表錄異〉，卷上，頁 79-80，「海鱣即海上最偉者也，其小者亦千餘尺，吞舟之說，固非謬也」、「鰐魚，其身土黃色，有四足，修尾形狀如鼉，而舉止趨疾，口森鋸齒，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懼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群鰐嗥叫其下，鹿怖懼落崖，多為鰐魚所得。」

147 陳元朋，〈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以犀角與犀牛為主體的個案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3(2010.5): 50。

念。在此視域中，中國天子是天下的中心，而受冊封的安南國王則是受支配的臣屬。顯然，《交州藁》正是透過這種充滿自我中心主義的框架，來建構其所感知的異域。至於陳孚的使交路線，去程所使用的是蒙元帝國境內的驛路系統，走陸路，穿越中書省、河南江北行省、湖廣行省，十二月下旬抵達邕州。進入邕州，走的則是忽必烈兩次出兵安南的軍事用道，並於正月二十四日抵達安南的大羅城。停留 52 日，然後於三月十五日啓程返國，離開安南後，回程走的是水路，沿著長江而下，九月使還回京，共歷時一年，全程約 115 驛，計 7700 餘里。

爲了更準確地探索《交州藁》中安南書寫的構成，我們必須細察詩人觀看安南的視角。其一是帝國之眼，著意在展示帝國的威權與將安南他者化。前者指的是一種無所不在的帝國心態，作爲蒙元帝國的使節，陳孚是帶著國族優越感來經驗異地的，如《交州藁》的命名，就寓含著要將安南納爲蒙元帝國「己域」的意圖。又稱安南國王爲「酋」、將安南的統治政權以「僞」來標記，皆可見其中所展示的帝國威權。後者則指陳孚有意將安南異化，主要出現於往返安南的國境內旅行中，這應是源自於中國向來對外圈蠻夷的恐懼，因而將其投射於安南這一客體，加上當時兩國之間戰爭一觸即發的緊張形勢，更強化了陳孚眼中安南的威脅性。其二是獵奇之眼，著意在展現異域的異質，這是異域書寫常見的觀看視角，在《交州藁》中主要集中於進入安南國境之後，其中有自然景觀，亦有文化景觀，通過種種奇觀場景的建構，陳孚特意強化當地的陌生感，讓安南成爲不同於在地家園的異域。

最後，探論的是《交州藁》主要採取的書寫模式，一是熟稔化的修辭策略，指的是挪借中國文化傳統中常見的典故成辭來表述作者所感知的異域。如《交州藁》在描繪自然景觀時，「蠻」、「瘴」二詞出現的頻率頗高，看似形容詞彙，其實是一種文化的類別，這是古典詩語對於南方異域，尤其是安南的熟稔化修辭，類似的情況，亦見於黑風鬼國、馬援、狄青、塗山會盟等典故的運用。這種書寫模式可以使讀者透過習以爲常的概念來理解安南，卻也因此植入了中國長久以來所積澱的想像與偏見。二是詩注並行的博物敘事，其僅見於〈安南即事〉。這首長達 102 句的五言排律是《交州藁》中最常被討論的作品，卻迥異於集中的其他安南紀行詩，因爲〈安南即事〉不僅是陳孚個人的旅途紀行，也是使節進獻給帝王之作。透過精煉的詩句與詳盡的散

體附注，《交州藁》以地理書式與異物志式的二種記敘方式，為蒙元帝王提供有關安南的考察，積極回應忽必烈想將安南收入帝國版圖的期望。其中有陳孚的親身經驗與直接觀察，也有源於博物知識的想像地理，由此形成紀實與想像交織的奇觀敘事，這種帶有異國風格與奇幻色彩的安南書寫在元詩中是獨樹一格的。

至此，我們對於《交州藁》的安南書寫已進行清楚的辨析。然而，值得一提的，在《交州藁》流傳的過程中，讀者最感興趣的仍是源自博物知識的想像地理，如郎瑛（1487-1566）就引《羸蟲集》、《星槎勝覽》所錄的「鼻飲」、「飛頭」之事以及「汪海雲亦能鼻飲」，作為「信陳詩之不誣也」¹⁴⁸的印證；清代晚期丐香（生卒年不詳）奉命送詔書至越南，稱「天涯海角，異俗殊風，瘴雨蠻煙，授餐食館。雖無鼻飲頭飛之怪，絕非耳濡目染之常」，¹⁴⁹亦將「鼻飲」、「飛頭」作為越南之行必須實地「證實」的異事。可以發現，「可信與不可信混淆的結果，往往最後是不可信較能取信於人」，¹⁵⁰在這裡，《交州藁》重製了「有書為證」的想像地理，展現接近奇幻的異國情調，而異事異物的敘述則開啓了讀者對於遠方的好奇，這似乎是這部旅行書寫一再被轉述與討論的原因。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班固著，江建忠標點，《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晉·干寶著，汪紹楹校注，《搜神記》，臺北：里仁書局，1970。

晉·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臺南：和裕出版社，2010。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註，《增補六臣註文選》，臺北：漢京文化公司，1983。

唐·段成式著，杜聰校點，《酉陽雜俎》，濟南：齊魯書社，2007。

148 明·郎瑛，《七修類稿》（《筆記小說大觀》第33編，臺北：新興書局，1983），卷49，頁713。

149 清·丐香，《越南竹枝詞》（自題），《清代海外竹枝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頁60。

150（英）Joanne P. Sharp 著，司徒懿譯，《後殖民地地理學》，頁20。

- 唐·張籍，《張司業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07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唐·貫休，《禪月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08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唐·劉恂，《嶺表錄異》，《四庫全書珍本》第 35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唐·鄭熊，《番禺雜記》，《歷代嶺南筆記八種》，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
- 唐·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唐·釋道世，《法苑珠林》，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 宋·朱輔，《溪蠻叢笑》，百部叢書集成《古今說海》，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
- 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宋·陸游，《避暑漫抄》，長沙：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
- 宋·趙汝适著，馮承鈞校注，《諸蕃志校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 宋·歐陽修等著，《新唐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 元·陳孚，《陳剛中詩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20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元·陳孚，《陳剛中詩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天順四年（1460）沈琮廣州刊本。
- 元·陳孚，《陳剛中詩集》，《元史研究資料彙編》第 27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據《託跋廬叢刻》影印。
-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元·傅若金，《傅若金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
- 元·熊夢祥，《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 元·黎崱著，武尚清點校，《安南志略》，北京：中華書局，2008。
- 明·宋濂等著，《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明·胡應麟，《詩藪》，臺北：文馨出版社，1973。
- 明·郎瑛，《七修類稿》，《筆記小說大觀》第 33 編，臺北：新興書局，1983。
- 明·鄧鐘，《安南圖誌》，《四部叢刊續編》第 27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 清·丐香，《越南竹枝詞》，《清代海外竹枝詞》，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 清·呂種玉，《言鯖》，臺南：莊嚴文化公司，1995。
- 清·顧嗣立編，《元詩選·二集》，北京：中華書局，2002。
- 楊鐮主編，《全元詩》，北京：中華書局，2013。
- 李修生等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 (越南) 未署作者,《皇越地輿志》,越南國家圖書館藏明命十四年(1833)刻本,館藏編號 R.2212·NLVNPF-0108。
- (越南) 吳時仕,《吳黃甲詩集》,越南國家圖書館藏本,館藏編號 R.642·NLVNPF-0679。
- (越南) 阮忠彥,《介軒詩集》,上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
- (越南) 裴輝璧編,《皇越詩選》,越南國家圖書館藏希文堂刻本,館藏編號 R.968·NLVNPF-0086-01。

二、近人論著

- 王玫珍 2004 〈元代異域風情詩探析〉,《人文藝術學報》3(2004.4): 57-84。
- 王 英 2002 「元朝與安南之關係」,廣州:暨南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
- 王 琳 2012 〈六朝地記:地理與文學的結合〉,《文史哲》2012.1: 94-110。
- 王 皓 2009 「陳孚《交州稿》與元代的中越文化交流」,成都: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碩士論文。
- 王德毅、李榮村、潘柏澄 1979 《元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 札奇斯欽 1980 《蒙古史論叢》,臺北:學海出版社。
- 田曉菲 2015 《神游:早期中古時代與十九世紀中國的行旅寫作》,北京:三聯書店。
- (美)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陳引馳、陳磊譯 2006 《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北京:三聯書店。
- 竹 天 1995 〈元朝與安南陳朝關係的幾個方面〉,《東南亞縱橫》1995.3: 8-9。
- 何方彤 2008 〈陳孚詩歌論〉,《浙江社會科學》2008.6: 106-112。
- (日) 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 2012 《忽必烈的挑戰: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新北:廣場出版社。
- (日) 杉山正明著,周俊宇譯 2014 《顛覆世界史的蒙古》,新北:八旗文化出版社。
- 李兆良 2012 《坤輿萬國全圖解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李嘉瑜 2014 《元代上京紀行詩的空間書寫》,臺北:里仁書局。
- 李 漫 2013 《元代傳播考——概貌、問題及限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沈文凡 2005 〈唐代「排律」詩體的隔代及域外之名稱確立初探——圍繞明代及韓國的排律創作與評論展開〉,《新疆師範大學學報》26.3(2005.9): 107
- 周如月 2009 〈古代嶺南「鬼門關」考〉,《廣西地方志》2009.3: 42-45。
- (日) 松浦友久著,黃仁生譯 2002 〈「七言排律」不盛行的原因——從對偶表現的本質說起〉,《中國文學研究》2002.4: 40-44。
- 姜義華注譯 1997 《新譯禮記讀本》,臺北:三民書局。
- 范宏貴 2007 〈中、越、老三國的鼻飲〉,《東南亞之窗》2007.2: 58-61。

- 查洪德 2014 《元代詩學通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美) 段義孚 (Yi-Fu Tuan) 著，徐文寧譯 2011 《無邊的恐懼》，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越南) 范文深 2008 〈安南即事之介紹〉，《漢喃雜誌》2008.3: 60-64。
- 唐曉峰 2010 《從混沌到秩序——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論》，北京：中華書局。
- 馬明達 1999 〈元代出使安南考〉，《中外關係史論叢》第6輯，鄭州：大象出版社，頁263-284。
- 馬曙明、任林豪編 2002 《臨海墓志集錄》，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 高友工著，黃寶華譯 2004 〈律詩的美學〉，《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張金蓮 2006 〈略論元代的中越交通〉，《蘭州學刊》2006.3: 42-44。
- 張德明 2014 《從島國到帝國——近現代英國旅行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許聖和 2006 「博物思維與六朝文學」，花蓮：東華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 陳元朋 2010 〈傳統博物知識裡的「真實」與「想像」：以犀角與犀牛為主體的個案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3(2010.5): 1-82。
- 陳荊和編校 1984 《大越史記全書》，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刊行委員會。
- 喻長霖等纂修 1970 《浙江省台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
- 黃世杰、楊楮 2014 〈交趾政治圖式變遷軌迹考〉，《廣西民族大學學報》36.3(2014.5): 125-132。
- 楊天保 2007 〈地名·歷史·觀念——基於嶺南鬼門關稱謂流變史的文化學解讀〉，《廣西民族研究》2007.2: 157-162。
- 楊 鐮 2003 《元詩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葛兆光 2011 《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葛兆光 2014 《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虞 坤 2011 「元代廣西對外交通研究」，南寧：廣西民族大學專門史碩士論文。
- 廖秀倩 2014 「《博物志》博物書寫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 廖肇亨 2011 〈從「搜奇獵異」到「休明之化」——由朱之蕃看晚明中韓使節文化書寫的世界圖像〉，《漢學研究》29.2(2011.6): 53-80。
- 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編 2010 《天文年鑑2009》，臺北：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
- 劉玉珺 2007 〈中國使節文集考述——越南篇〉，《首都師範大學學報》2007.3:

29-35。

- 劉苑如 2007 〈題名、輯佚與復原——《玄中記》的異世界構想〉，《中國文哲研究集刊》31(2007.9): 29-74。
- 鄭炳林、魏迎春 2005 〈俄藏敦煌寫本王玄策《中天竺國行記》殘卷考釋〉，《敦煌學輯刊》2005.2: 3-11。
- 鄭毓瑜 2005 《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北：麥田出版社。
- 鄭毓瑜 2012 《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蕭啟慶 1983 《元代史新探》，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 蕭啟慶 1999 《元朝史新論》，臺北：允晨文化公司。
- 謝世忠 2004 《中國與北東南亞的場域》，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 (英) Joanne P. Sharp 著，司徒懿譯 2012 《後殖民地地理學》，臺北：韋伯文化國際出版公司。
- (英) John Berger 著，吳莉君譯 2005 《觀看的方式》，臺北：麥田出版社。
- (英)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 2005 《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
- Sell, Jonathan P. A. 2006. *Rhetoric and Wonder in English Travel Writing, 1560-1613*. Lond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 (美)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 2006 《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公司。

Vietnam Travel Writing in the *Jiaozhou Manuscript*

Lee Chia-yu^{*}

Abstract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the vast territory of the Mongolian Empire brought an increased cultural richness and novelty to the literature of the period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previous ethnic Han dynasties. One of these novel themes was *Yiyu shuxie* (異域書寫 writings on foreign lands).

In both times of war and peace, a continuous stream of envoys traveled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Mongolian Empire and Vietnam, which resulted i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 volume of Vietnam travel poetry written in the Yuan dynasty. In this article, Chen Fu 陳孚 (1259-1309) serves as a case study of this phenomenon. Chen Fu was a southerner appointed as an ambassador in 1292, accompanying Liang Zeng 梁曾 (1242-1322) on a mission to Vietnam. The *Jiaozhou Manuscript* 交州藁 is a collection of 108 travel poems written by Chen Fu during his travels through Vietnam.

As an ambassador, Chen's trip to Vietnam was a mission of national importance, which makes his particular perspective an exotic one: clearly, he was no ordinary traveler.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ow Chen Fu describes his Vietnam tour, and through what forms or images he perceives Vietnam. Additionally, since poetry is used as a form of self-expression in the *Jiaozhou Manuscript*, then how would this affect how he writes about Vietnam? An analysis of these questions will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Jiaozhou Manuscript*.

Keywords: Yuan poetry, Vietnam travel poetry, writings on foreign lands, Chen Fu 陳孚, *Jiaozhou Manuscript* 交州藁

* Lee Chia-yu is a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Creative Writing at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